

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2006-6-26 马启民 阅读1853次

邓小平理论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对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对它的研究已从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实际上划分为国内与国外两大研究地域。关注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起始阶段

对邓小平和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国外比中国起步要早。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外这种研究形式还不能称作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但毕竟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河。国际上对邓小平的分析和报道,最早可追溯到1940年出版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海军武官卡尔逊写的《中国的双星》一书。卡尔逊1937年、1938年两次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那里结识了邓小平。在书中他以简练、明快的笔墨描述了与邓小平第一次会面的情景,说邓小平的头脑像“芥菜一样辛辣”。这是西方人撰写的首次介绍邓小平的书籍。1956年,日本学者吉田东佑著的《中国革命的一百单八将》一书,对邓小平的简历作了认真的介绍,并对建国初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任政务院副总理以及邓小平于1953年9月兼管财政一事做了评论。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邓小平在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一报告,在国际上引起密切关注和较大影响,国外中国学界和外交界对邓小平其人和这一报告作了详细评论和研究。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在中苏两党间谈判、论战之中作为中方主帅之一,是苏联谈判的主要对手,引起了苏联中国学界和外交界的注意并进行跟踪研究。“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以其独到的思想、传奇的经历以及对中国社会走向的深刻影响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名著《漫长的革命》一书中,用一定的笔墨介绍了邓小平与毛泽东在国内政策上的分歧,谈到了所谓的邓小平的经济主义。1973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复出引起国际传媒的关注,各国新闻媒介争相报道,“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的雅号传遍世界。在这些研究中,不少国外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思想。日本学者大久保泰著的《中国共产党史》(1971年,书房社出版)、久田幸助著的《我的中国人研究笔记》(1974年,讲谈社出版),都对邓小平的思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评论。1977年日本学者和田武司、田中信一合著的《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1977年,德间书店出版)一书,对邓小平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脉络作了比较客观、公正、准确的评价。这一时期,研究学术水平较高的是美籍华人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说,1977年9月他发表的《毛泽东思想、为继承权的最后斗争和以后的时代》(该文定稿于1977年4月)一文,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积极肯定和赞许邓小平的治国主张,并指出邓小平的思想与“两个凡是”派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盾,认为这是一个“基本分歧”,从而预示着中国还有一场深刻的斗争,反映了该学者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总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并且有些学者已开始对邓小平及其思想进行初步的研究,有些成果达到较高的水平。

二、国外学者对邓小平个人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思想家个人生平活动与其思想往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某一理论首创者的生平实践活动,分析其个性特征、人格力量、政治才能,揭示其理论与其经历的相互关系,应该是研究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外学者非常重视对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他们认为“人们对邓的生活感兴趣,是由于他的生活能揭示中国的政治特别是中共内部政治的发展变化”。“1949年以后他的生活经历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此外,邓小平在政治命运上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不仅需要解释,

而且显而易见对中国的政治进程具有更普遍的启示。”俄罗斯学者巴拉赫塔和库兹涅佐夫在对邓小平革命生涯评述中写道：“实际上，邓小平是一位出众超群的人，是一位具有坎坷经历的人。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有过升迁和跌落，有过胜利和失败。他关于中国改革的构想并不是一下子产生出来的。看来，这一构想的产生是他作为具有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的一位大政治家合乎规律的成长过程。”为此，国外学者把邓小平的个人经历作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投入较大精力，出版和发表了一大批论著。其主要有：(日)和田武司、田中信一：《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1977年，德间出版社)、(法)若拉·王《邓小平：法国岁月》(载中国季刊1982年第92期)、(德)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1987年德文版)、(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传》，(中译本1988年版)、(英)大卫·邦那维亚(David Bonavia)《邓小平传》(1988年版)、(前苏联)M·雅科夫列夫《邓小平的政治肖像》(俄文版1989年)、(前苏联)巴拉赫塔、库兹涅佐夫《风风雨雨六十五载——邓小平革命生涯》(俄文版1989年，出自1989年莫斯科出版的《人们在议论他们——国外活动家的政治肖像》)、(澳)大卫·古德曼《邓小平传》(英文本版1990年)、(英)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英文本版1993年)、(美)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1988英文版)、《周恩来与邓小平》(中译本1988年)、(美)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译本1991年)等。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研究，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永不服输的革命家的形象，大大加深了国际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状况在国外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国外学者对邓小平历史地位和理论内容的研究

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指出，邓小平在历史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此，致力于研究邓小平的学者们，要根据他的各种政治角色和他在不同时期的功绩，来评价他在历史中的地位”。

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国际社会给予了积极的充分的评价。国际社会评议道：邓小平作为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的英明政策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荣誉，而且也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他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历史将这样记载——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世界级的领袖。研究邓小平的外国学者，根据邓小平在当代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四个方面对邓小平历史地位做出了积极评价。其一，最成功的改革家；其二，“中国现代化之父”；其三，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其四，“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事业)的救星”。这些评价，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改革浪潮、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由冷战转入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等四个主要方面评价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这些评价是客观的和深刻的。

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而是隶属于对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研究。因此，大多数的研究并未专门界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发表对邓小平理论的分析与评论。但也有文章和著作从基础概念研究开始，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型的特征。在研究的范式上，虽未形成对邓小平理论从体系上的整体研究，但专题式的研究却较为普遍与深入。比如对邓小平著作与特点、邓小平理论形成阶段、思想方法、理论属性与特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主义本质论、对外开放思想、外交思想、军事思想，“一国两制”思想、邓小平的改革观、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改革的经验及国际影响等都有深入、细致的分析。仅以对邓小平理论属性和特征的研究为例，就提出了多种分析框架，即：“民族共产主义”、“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后社会主义”等等。

在对邓小平理论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由于国外学者知识基础、理论背景、各自经验的不同，表现出各自特色。总的来说，对邓小平理论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但不少分析不够准确、甚至有所歪曲。

四、国外学者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方法

国外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在发掘新的分析模式和方法这一点是富于进取的”。这种状况形成了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的态势。其主要方法如下：其一，现代化理论分析法。西方学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也是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它强调科学技术革命的重要性，

把如何利用当代知识给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提供机会作为评价社会能力的标准,认为这种观点与现代化研究极为接近。日本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方法上“虽然留有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的阶段二元论进行社会分析的痕迹,但实质上十分接近欧美式近代化论的认识和分析方法”。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正经历着现代化阶段中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认为毛泽东是具有超凡魅力的权威,邓小平是有组织的权威。总之,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学者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框架之一。但这种现代化理论并未区分西方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之间的不同,因而本质上是西方现代化理论作为分析基础的。其二,马克思主义概念研究法。这是国外比较同情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左翼作家的研究方法。这里讲“概念法”,是指这些学者并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或者说,是以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邓小平理论的。一方面,由于采用这一方法,提出的见解有些是符合实际的,比如认为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髓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又认为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又远离了社会主义,从而使自己陷入一种自我矛盾之中。其三,比较研究法。国外学者对邓小平理论研究采取了广泛而深入的比较。既有国内比较,也有国际比较;既有纵向比较,也有横向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比较。俄罗斯学者波尔加科夫道出了其中原因:“比较法好像是西方研究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文章的必用方法。我认为这种比较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进程本身提示要这样做。”他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特色与独特的历史贡献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好地展现和把握。其四,实地考察研究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与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通过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方式,使国外学者在中国长期滞留成为可能。这促进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国外学者不再局限于阅读和研究中国的报刊资料 and 文件,也不再拘泥于理论的思辨,而是更多采取了实地调查、实际考察的实证性研究。在美国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中,“现在这已成为研究生写博士论文的必须条件”。实地考察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把握理论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在于评估理论的影响力。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也在于研究影响中国发展的复杂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所做的巨大贡献,也对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障碍进行了分析,有不少深刻的见解。其五,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法。国外一些学者认为,对中国当代史和中国领导人物的思想研究都不能忽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他们指出,当代中国的历史和领导人物的思想是继承与变动的统一,“新”与“旧”处于不断的相互作用与紧张的动态过程。因此,对中国领袖人物思想研究,要注意中国历史与文化因素对领袖人物思想的影响,注意到政治领袖人物行为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其六,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是在对已有的方法进行批判与改进中进行的。上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受“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最突出的研究模式,是把着眼点放在寻找和确立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把它看作是代表中国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对外政策等主要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追求,而在80年代,人们更注重社会结构对中国领导层与群众两方面行为的限制。正如美国学者哈里·哈丁指出的,无论在对中国国内还是对外方面的研究,行为主义已被结构主义方法所取代。

马启民, 武汉大学论文博士在读,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院长

来源: 《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

网站编辑: 宋扬

[关于我们](#) | [服务范围](#) | [网站合作](#) | [版权声明](#)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07 All rights reserved Sichuan Social Science Online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信息网络中心设计制作

mail: sss@sss.net.cn

蜀ICP备05003527号